

【文学文献学】

谢灵运摩崖诗刻辨伪与考佚

邱 亮

【摘要】浙江丽水地区的谢灵运摩崖诗刻共两处：一在青田，一在缙云。兹以相关诗文为线索，进行实地踏勘，存者可证其时，佚者可考其地。青田诗刻现存青田石门洞，前人已指其伪。今据相关诗文考证，认为当刊于徐峤来游之后，裴士淹去世之前，即唐开元二十八年(740)至大历九年(774)之间，同时亦可辨《谢灵运集》中相关诗文所指“石门”之异，《游名山记·石门山》所记为青田，《登石门最高顶》等诗所记为始宁。缙云谢诗题刻最早见于李白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自注，由于时代悬隔，其地久佚，今考以明人王思任《游唤·仙都》，知题刻在今小赤壁上，据此亦可正杨齐贤、朱谏、杨慎、王琦等校注李诗之误。

【关键词】谢灵运诗刻；青田；缙云；真伪；存佚

【作者简介】邱亮，吉首大学文学院讲师。发表过论文《六朝石刻俗字考释八则》等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文学遗产》(京)，2021.5.55～65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“乾嘉以来碑刻辨伪研究”(项目编号17XZS004)阶段性成果。

晋宋是地理大发现的时期，也是山水文学勃兴的重要时期。谢灵运在任职永嘉太守期间，遍历诸县，动逾旬月，创作了大量吟咏吴越山川的诗作。而谢灵运书法亦擅绝一时，《宋书》本传记载：“灵运诗书皆兼独绝，每文竟，手自写之，文帝称为二宝。”^①谢氏诗书名动海内，偶或乘兴题刻，亦使山川焕采，崖壁生辉。

就笔者耳目所及，浙江丽水地区谢灵运摩崖诗刻共有两处：一在青田，一在缙云。诗刻或真或伪，或存或佚，未有定讞，今试为考证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青田石门洞诗刻辨伪

乾嘉以来，李遇孙、王尚赓等学者大力搜访括苍石刻，竟意外于青田石门洞岩壁发现谢灵运诗刻二首，即《石门新营》与《登石门最高顶》，石上间有唐、宋题刻，说明石刻甚古。谢诗题刻一出，乃石破天惊，王尚赓曾详述其事：

括苍僻处浙东，诸磨崖摹本甚少，即间有好事者欲得之，亦不过倩工往拓，择其易施力者拓来，故谢公石刻向无人道及，余与王芝庭云舫亲往搜寻，挟险

扪幽，奇迹乃显，怀宝而归，何啻获一真珠船耶。(李遇孙《括苍金石志》卷一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，第1辑第15册，第11292页)得之如获至宝，若确系谢诗原刻，诚可睹谢公翰墨之风神，决古今文字之狐疑，谓之珍珠满船，亦不为过。

诗共两首，左右排列，右为《石门新营》诗，楷书，自右而左共十一行，行七至十五字不等，字径三厘米左右。今据石刻拓本及《括苍金石志》《谢灵运集》校录如下：

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，回溪石濑，修竹茂林。/五言。宋永嘉郡太守谢灵运。/(跻险筑幽)居，(披云)卧(石门)。苔(滑)谁能步，/葛弱岂可扪。袅袅秋风过，萋萋春草繁。/美人游不还，佳期何由敦。芳尘凝瑶席，/(清)醑满金樽。(洞)庭(空波)澜，桂枝(徒攀)翻。/结念(属霄)汉，孤景(莫与)援。(俯)濯(石下)/潭，仰看条上猿。早闻夕飏急，晚见朝日/(瞰)。崖倾光难留，林深响易奔。(感)往(虑)有/复，理来(情)无存。庶(持乘)日用，得(以)慰(营)魂。/匪为众人说，冀

与智者论。/

左为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，楷书，自右而左共九行，行十二至十三字不等，字径三厘米左右。校录如下：

石门最高顶一首。/晨策寻绝(壁)，夕息(在山栖。疏峰)枕高馆，(对)岭临回溪。长林罗户穴，积石/拥(基阶。连岩觉路塞)，密(竹)使径迷。/(来)人(忘新术)，去子(惑故蹊)。活活夕流/(驶，噉噉)夜(猿)啼。(沉)冥(岂别理，守)道/自不(携)。心(契)九(秋)千，目玩三春萋。居/常以待终，处顺故安排。惜无同怀/客，(共)登(青云梯)。/

按，该石上有覆刻，字迹多被后世题名所掩，故漫漶、缺漏较多，括号内均系据谢集补出的内容。石刻经反复覆刻，说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堆积。关于石刻年代，王尚赓云：“今观石刻，可以破千古之惑，虽为唐宋人题名所掩，愈见是刻之古，非后人补勒可知矣。”^②认为系谢灵运原刻。与此同时，亦有稍存疑惑者，王尚忠云：“岂当时所刻耶？抑后来好事者所补刻耶？其诗内有唐人和诗间刻，又有宋人题名盖其上，即补刻当亦在唐时。”^③认为可能系原刻，也可能为唐代补刻，未能遽断。

今人或信或疑，聚讼未定。徐文平《处州摩崖石刻》^④《浙南摩崖石刻研究》^⑤认为系原刻。顾绍柏认为系后人所刻，而时代未明：“清王尚赓、李遇孙等于道光十二年(公元1832年)在浙江青田县石门洞意外发现灵运此诗的石刻(上又加刻唐宋人题诗、题名，知甚古)，以为灵运所写乃青田石门山(见《括苍金石志》卷一)。其实皆误。”^⑥依据是《石门》诗所写石门在当时的始宁县，与青田石门实非一地。郑嘉励接踵其说，认为系伪刻，并进行了断代研究：“石门洞‘谢灵运诗刻’不晚于苗振来游的年代，不早于杜光庭著《洞天福地记》的年代。”^⑦按，苗振系北宋人，尝于《石门新营》覆刻题记：“尚书郎苗振、閤门祇候常鼎同游。辛卯孟冬初五日。”辛卯，即北宋皇祐三年

(1051)，郑先生即将此定为伪刻的时间下限。又根据杜光庭所撰《洞天福地记》为天下名山洞府排定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、七十二福地，因石门洞并不在列，从而认为青田石门开发较迟：“石门洞未能进入杜光庭的视野，反倒‘青田山洞’(即今青田县城附近的太鹤山)列为‘第三十小洞天’。”故以《洞天福地记》的成书时间为其时间上限。后郑先生又另撰一文，对所持观点进行了修正：“石门洞‘谢灵运诗刻’当刊刻于唐开元、天宝年间或稍前，大概比较接近于将会稽郡始宁县‘谢公石门’附会为永嘉郡‘青田石门洞’的时代。”^⑧

确如二位先生所言，虽然青田石门洞发现《石门新营》石刻，但该诗并非谢灵运作于永嘉(时青田属永嘉)太守任上，因此断为伪刻的意见是可取的。然而郑先生提到的断代问题，前后二文结论不同，我们认为“晚唐至北宋中期”的说法偏晚，而“唐开元、天宝年间或稍前”的说法亦较模糊，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。

检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，涉及“石门”的诗文共有四处：诗凡三首，即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《石门岩上宿》；文凡一篇，即《游名山记》。又据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记载：“在(永嘉)郡一周，称疾去职，从弟晦、曜、弘微等并与书止之，不从。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，并有故宅及墅，遂移籍会稽，修营别业，傍山带江，尽幽居之美。”^⑨谢灵运守永嘉，卸任后隐居始宁，皆依山傍水，优游其间。

关于“石门”，目前学界意见不一，要么将谢集所见“石门”全部归入青田(参见《浙南摩崖石刻研究》，第72页)，要么全部归入始宁^⑩，这也是导致“石门”面目难辨的重要原因。我们的看法，是将谢集中的“石门”一分为二，即谢集石门所涉，实有二地。我们注意到两条县志记载的差异，嵊县(今浙江嵊州)系始宁沿革而来，《(民国)嵊县志》云：

县西北九十里，亦有山名石门，两石峭立如门，

谢灵运有《登石门最高顶》及《夜宿石门》诗。((《民国)嵊县志》卷一,民国二十三年[1934]排印本,第16a页)

又《青田县志》云:

石门洞,在浙江处州府青田县西七十五里,两峰壁立,高数十丈,相对如门,因以为名。洞东高岩有瀑布,自上潭直泻至天壁,凡三百余尺,自天壁飞洒至下潭,凡四百余尺。……按《永嘉记》:石门洞周回四十里,青牛道士居之。谢灵运《名山志》曰:石门山两岩间微有门形,故以为称。瀑布飞泻,丹翠交耀。又云:石门溯水上,入两山口,两边石壁,右边石岩下临涧水,灵运为永嘉太守,蜡屐来游,初开此洞。……有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,又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》诗,又《石门岩上宿》诗,共三首,梁丘希范、唐丘丹、裴士淹、郭密之皆有诗,石刻今存。刺史李季真作《石门山记》及李阳冰篆石已断裂。唐末,洞废不修。《青田县志》,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三〇七四,明嘉靖隆庆间内府重写本,第6a页)

经实地考察,二者地貌确有不同,嵊县峭拔在门,而青田壮丽在瀑,迥然有别。在引用谢灵运诗文时,地志显然有所取舍,《嵊县志》侧重在诗,《青田县志》虽诗文备举,然侧重在文,详为引述,对于诗只是略言有石刻存焉。这也提示诗、文可能各有所指,下面我们不妨分别讨论。

其一,谢灵运之诗。“石门”诗共三首,除前引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外,为窥全豹,我们不妨将谢集余下《石门岩上宿》一首具引于下:

朝攀苑中兰,畏彼霜下歇。暝还云际宿,弄此石上月。鸟鸣识夜栖,木落知风发。异音同致听,殊响俱清越。妙物莫为赏,芳醑谁与伐。美人竟不来,阳阿徒唏发。(《谢灵运集校注》,第183页)

不难发现,“石门”三诗,中有高山绝壁、苑兰溪竹等,备写石门之胜,却唯独于瀑布不置一词。而关于谢

诗,南朝锺嵘《诗品》列之为上品,推崇备至,云:“若人兴多才高,寓目辄书。内无乏思,外无遗物,其繁富,宜哉!”^①列锦繁复,无所遗漏,此为谢灵运山水诗之所长。白居易《读谢灵运诗》亦谓:“泄为山水诗,逸韵谐奇趣。大必笼天海,细不遗草树。”^②想始宁果有瀑布存焉,谢诗囊括万象,岂容有此一疏?故明代王思任游青田石门,曾深表疑惑:“谢康乐席父祖之资……尔时吟中未及飞瀑,岂天故秘之邪?”^③而魏源《石门洞瀑》诗序谓:“非康乐所游之石门也,故谢诗不及瀑。且营构馆榭,明为始宁墅之大小石门。”^④正可作其解语。

其二,谢灵运之文。《游名山记》中有“石门山”记,即前《青田县志》所引《名山志》,所写主要为瀑布之胜。石门洞泻玉百尺,其后南朝梁丘希范又复来游,诗云:

神功不可限,未见常疑无。扞天倒明玉,蔽地泻隋珠。袞袞犹马奔,熟视如虹趋。丹壁似绣被,翠磴类罗襦。前瞻真刻峭,旁观复槃纡。斑驳生虎纹,参差出龙须。金鉴照石洞,木兰润仙衢。(《洞霄宫志》,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三〇七四,第7b页)

此诗亦写瀑布之胜。青田石门山养在深闺,自南朝以来渐为人识,谢灵运《游名山记·石门山》、郑辑之《永嘉郡记》、丘希范《石门洞》等皆为畅游石门之作。

由此可证,谢集所见“石门”实分两地,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等之“石门”,盖康乐之所居也,在始宁;《游名山记》之“石门”,盖康乐之所游也,在青田。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将《游名山记》之石门列入“会稽郡”,与地貌不合,应系误断。

当然,谢氏石门的说法,后世尚有多种。或认为系温州石门,如王尚忠所论:“其时处州属永嘉郡,则谢公所咏之石门,虽未能分其为温州为处州,而要之在宋时之永嘉者无疑,故《处州志》亦纂入此二诗,细玩诗中写景,与处州不甚肖。”^⑤王尚忠注意到谢诗所

写非青田石门,但忽略了始宁尚有石门的事实。至于认为在庐山^⑩、缙云^⑪者,皆属节外生枝,失之愈远。

谢灵运诗文中的“石门”差别明显,然而由于谢集文字的分合散佚,以及郡县的沿革废立(隋开皇九年[589]废始宁县,唐代永嘉郡亦有废立),后世往往将二“石门”混为一谈。去六朝未远的唐代即是如此,这一点在《文选》所收谢灵运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李善注中便有反映,如云:“灵运《游名山志》曰:石门涧六处,石门溯水上,入两山口,两边石壁,右边石岩,下临涧水。”^⑫由于系文献疏证,而缺少必要的地理考察,李善很自然地将谢灵运《登石门最高顶》与《游名山志》中的石门联系在一起。又考以日藏古抄残本《文选集注》,存《石门新营》一诗,题下注引公孙罗《文选钞》:“灵运《游名山志》云:石门在永嘉。”^⑬此注可解一疑窦,《游名山记》之“石门”盖即康乐所游,在青田(时属永嘉),公孙罗所引可为确证。但此注又将忝一疑窦,“曹宪以梁《昭明文选》授诸生,罗与魏模、李善相继传授,于是其学大行,罗有《文选注》《文选音义》”^⑭,公孙罗与李善同时,其注亦将诗、文所见石门混为一谈。我们又知道,《文选》在唐代颇为盛行,“唐人最重《文选》”,因此这样的谬误自然流传较广。一个直接的反映是,青田石门洞中留存的早期题刻多附会谢诗,均与《文选》李善、公孙罗注的谬误如出一辙。

同时,青田石门洞题刻的形成也与山水文学的消长关系密切。南朝宋是山水文学的勃发期,盛唐则是山水文学的兴盛期,中间有所起伏。在此背景下,经过南朝后期至初唐的消歇,至于开元、天宝年间,浙江青田石门游历渐成风气。证之以该地所存题刻,有年代可考者最早为唐开元二十八年之后的徐峤《游石门山》残刻^⑮,同时亦有佚名《奉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残刻,其他如天宝年间张愿《题石门山瀑布八韵》残刻等。天宝八年(749)郭密之《使永嘉经谢公石门山作》云:“谢客今已矣,我来谁与朋。”又《永

嘉怀古》云:“缅怀谢康乐,伊昔为旧守。”大历初丘丹所作《奉使过石门观瀑》,其序云:“谢康乐,宋景平中为永嘉守,有《宿石门岩上》诗。余六代叔祖梁中书侍郎天监中有过石门瀑布诗,后亦为此郡。小子大历中奉使,窃有继作。”其诗云:“吾祖昔登临,谢公亦游衍。”遍览诸诗,耐人寻味的是,除内容未能详知的残刻外,其他诗刻皆是模仿或谈论谢诗。可见,在一般唐人看来,青田石门即谢公石门,二者混然无别,这也成为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等伪刻产生的重要认识基础。

关于诗刻尚有一问题,即有关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二诗题刻历史层次的清理。徐文平谈到:“谢灵运《石门新营》《石门最高顶一首》摩崖诗刻虽曾被唐人《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诗刻覆盖,北宋皇祐五年又被王起等题名所覆刻,但原迹仍依稀可辨。凭此足可证明两诗刻在唐开元之前就已出现。”(《浙南摩崖石刻研究》,第76页)结合前文及徐先生所言,《石门新营》被苗振题记所覆刻,时在北宋皇祐三年,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被王起题记所覆刻,时在北宋皇祐五年(1053)。

至于《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是否属于覆刻,则颇可怀疑。《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作者无考,诗亦不存,原刻位于《石门新营》诗末两行之间,作“奉和徐大使游石门山”,而徐大使其人可考,即徐峤,徐氏原作仅存数行残刻:

游石门山。敕采访大使润州刺史徐峤。维舟青溪泊,徐步石门瞻。竅屈借岩洞,空□□□纤。□飞下习□,响(下缺)

《两浙金石志》云:“《唐书》开元二十一年,诸道置十五采访使检察,如汉刺史之职,徐峤、张愿皆以郡守兼此,盖皆江南东道采访使也。苏州本隶江南道,天宝元年改为吴郡,又改刺史为太守。徐峤之刻当在开元二十一年之后。”^⑯其说可从,然而排比史料,徐峤任润州刺史的时间尚可进一步查实。据近年新出

《徐峤墓志》记载：“其在润州时，兼江东道采访处置使，以公威名远振，化截方隅也。又兼长乐、建安等郡经略大使；及移晋陵使，并如故。”^②但关于徐峤润州之任的具体时间未详，又墓志云：“乃除大理少卿，哀敬折狱，小大以情，至诚所通，在微斯应。有鹊巢于狱户，罪人名在史籍者，羊啖其籍，翔鸟求哺，俯驯阶事，玺书光赞，束帛副焉。寻改河南少尹、润州刺史，其政不同，其理则一。”“寻改”二字说明改任上距大理少卿不久，而大理职事可考，检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：“二十五年九月奏上，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，发使散于天下。其年刑部断狱，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。大理少卿徐峤上言：大理狱院，由来相传杀气太盛，鸟雀不栖，至是有鹊巢其树。于是百僚以几至刑措，上表陈贺。”^③“有鹊巢于狱户”与“至是有鹊巢其树”符节相应，时在开元二十五年(737)。

又《桓臣范墓志》^④，系徐峤所撰，结衔为太中大夫、行河南少尹、上柱国、慈源县开国公，桓氏葬于开元二十七年(739)十月十四日，说明此时徐峤在行河南少尹任上。又考徐峤为其妻所撰《王琳墓志》，署为润州刺史、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、慈源县开国公徐峤，谓其妻以辛巳之年秋七月二旬有八日薨于润州之正寝。辛巳即开元二十八年，时在润州任上，同时据淳熙《三山志》，福州之任亦在是年^⑤，说明转领江南诸职当自二十八年始。徐氏任上尝游青田石门，《奉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一诗既为奉和，亦当与徐峤诗刻同时。

如徐先生所言，《奉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覆刻于谢诗之上，则谢诗必然早出。然而经过对石刻的实地勘验和拓片的细致考察，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，当是《奉和》早出，而谢诗晚出，何以见得呢？通过考证可逐步缩小谢诗题刻的时间范围。隋代以来始宁、青田地理的变化，导致两地“石门”的混淆，《文选》李善、公孙罗注亦见舛误，谢诗题刻受此地理观念的影响，当系晚出，且诗题下标“五言”，亦与《文选》体例

相沿，故不应早于李善、公孙罗注《文选》所处的初唐。唐代江浙游历之风到盛唐方始勃兴，今日所见唐代最早题刻徐峤《游石门山》已迟至开元之末，以此衡之，谢诗题刻又不当早于盛唐。换句话说，伪刻很大可能系盛唐山水文学影响下的产物。

此外，石刻今存，叠压关系客观存在，也必然有时间先后之别。可贵的是，石刻共有三层叠压(参见[图1])，其中两层断代明确：一层为《苗振题记》，题刻时间为北宋皇祐三年；一层即《奉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，题刻时间在开元二十八年之后。《苗振题记》时代相对晚些，暂不考虑；而《奉和徐大使游石门山》时间较早，作为断代的参考是比较理想的。由于伪刻存在隐蔽性，缺乏准确和必要的时间信息，这种时间排序仅仅依靠文献内容本身很难完成。但是作为文物，被反复刊刻，其痕迹实际上比较明显，就像文物的地层一样，可以很好地利用细微特征进行分析，见微知著，很多历史堆积能够实现剥离。而考察该段石刻可知，《奉和》在《新营》末二行，字数不多，字形略小，且并不平行，如系加刻，自当以《新营》为参照，相向而行。而通过仔细勘验会发现，“奉和”一行明显右倾，且“奉”系开头一字，与《新营》诗“乘”字叠合，“和”字亦局促。试想如“奉和”系后刻，则并不至甫一落笔即与他刻相抵牾，未加避让，甘落下乘，而必当于宽绰处从容奏刀，使游刃有余。相比之下，苗振题名则表现出明显的覆刻特征：一是字形较之底刻粗大，二是行款与《新营》保持统一。要之，从刻写时间上看，则《奉和》最先，所刻轻浅，内容磨泐将尽；《新营》其次，题刻加重，而四抵周正；苗振题名最末，覆刻于上，字径宽大，字口深峻，从而造成谢诗题刻残断不堪。经过对先后叠压关系的清理，我们认为谢诗题刻当晚于徐峤题刻，即至少在开元二十八年之后。

解决了时间上限的问题，再来考索谢诗题刻的时间下限问题，其实也有消息可寻。检历代诗文，与

石门相关的诗作尚为数不少。其中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三〇七四《洞霄宫志》收唐裴士淹诗一首,颇引人注意,其诗云:

溪竹乱花鸟,是月春将暮。登栈过崖畔,空间瞻瀑布。千龄无断绝,百尺恒奔注。高岩迸似珠,半壁洒如雾。澹滟水澄澈,欹倾石回护。药房森自闲,苔径官谁遇。天翠落深沼,云华生轻树。班输难效功,严马何能喻。胜迹盖为寡,斯游诚可屡。谢公镌旧词,安得寝章句。(《洞霄宫志》,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三〇七四,第8a页)

此处写游历石门,所见瀑布之胜,风景秀异。结句“谢公镌旧词,安得寝章句”,谓此处已有谢灵运题刻诗作,而面对如此美景怎能停止续作新诗呢?从一“镌”字,分明可见谢公题壁在焉,而旧词盖即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等诗。

裴氏曾经目验《石门》诗刻,前文所引《青田县志》谓有谢灵运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《石门新营》《石门岩上宿》,又有裴士淹等诗刻遗存。说明谢诗与裴诗俱在,只是时过境迁,裴氏诗刻渐至磨灭,《石门岩上宿》也已踪迹无寻。《永乐大典》今犹剩只鳞片爪,裴诗赖以保存,可谓幸甚。

以上足以说明,谢诗刊成于裴氏游历之前。那么裴氏是因何游历?何时游历呢?检《唐刺史考全

编》卷一五〇“温州(东嘉州、永嘉郡)”,内附详细考证,并引顾况《祭裴尚书文》:“呜呼,天祸瓯邦,尚书告薨;哀哀瓯民,罢市辍舂。”^②裴尚书即裴士淹,曾任温州刺史,后卒于任上,时在大历九年,裴氏来游盖当在此之前,可将此作为谢灵运诗刻的时间下限。

谢诗题刻的断代,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证据材料,一是文物的,一是文献的。具体来说,文物证据适用于时间上限的确定,而文献证据则适用于时间下限的确定。经过上述考证,可知青田石门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《石门新营》二诗系唐刻,时间不早于开元二十八年,不晚于大历九年。石刻虽伪,但作为谢灵运诗作本身并无问题,这也为我们提供了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《石门新营》系年比较确切的早期文献版本,弥足珍贵。谢公“石门”问题盘根错节,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分析,可将《谢灵运集》中的“石门”一分为二,《游名山记·石门山》所记为青田,《登石门最高顶》等诗所记为始宁,虽名同而异实。

二、缙云小赤壁诗刻考佚

青田诗刻自清代被发现以来,声名大噪;而缙云诗刻,向来湮没无闻。清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、李遇孙《栝苍金石志》、今人徐文平《处州摩崖石刻》等广收地方石刻,皆未遑措意。千百年来处于隐没之间,未为人识,今试加考索,表而出之。

关于缙云诗刻的记载,最早可追溯至李白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一诗,五言长篇,其中多处言及谢灵运,亦多处谈到江浙历史遗迹。该诗是一篇带有鲜明地理游记性质的赠别诗作,作于天宝年间,所赠对象为魏万,后易名魏颢。魏万倾慕李白,“谪仙游梁园,爱子在邹鲁。二处一不见,拂衣向江东”^③,寻而未获,更南下沿途相访,历时十月,计程千里,最终会于扬州。李白嘉其高谊,感其深情,遂以诗酬赠。

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一诗详述魏万行踪始



[图1]《石门新营》诗拓片

末,其中永嘉之行,海陆兼程方始到达,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段,序云:“永嘉观谢公石门。”诗云:

眷然思永嘉,不惮海路赊。挂席历海峤,回瞻赤城霞。赤城渐微没,孤屿前峣兀。水续万古流,亭空千霜月。缙云川谷难,石门最可观。瀑布挂北斗,莫穷此水端。喷壁洒素雪,空蒙生昼寒。却寻恶溪去,宁惧恶溪恶。咆哮七十滩,水石相喷薄。路创李北海,岩开谢康乐。(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。一作:岭路始北海,岩诗题康乐。)松风和猿声,搜索连洞壑。(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一四,第2a-2b页)

李白平生对谢灵运亦多倾慕,该诗“挂席历海峤,回瞻赤城霞”,即效仿谢灵运《游赤石进帆海》“扬帆采石华,挂席拾海月”而来,序谓“永嘉观谢公石门”,诗谓“岩开谢康乐”,可见李白对谢公遗迹亦是心驰神往。其中“岩开谢康乐”下有李白自注:“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。”魏万与李白行程相左而未遇,因念及谢灵运曾官永嘉,故挂帆以游,沿途又有幸目睹谢灵运恶溪诗刻,成为此番永嘉之行的重要收获。

李白诗歌为我们保留了有关谢灵运诗刻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,然而李白诗歌闳肆汪洋,难以方物,反而导致注李者颇为寥寥,后世对李诗的诸多问题亦不甚了了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:“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》三十卷。宋杨齐贤集注,而元萧士赞所删补也。杜甫集自北宋以来注者不下数十家,李白集注宋元人所撰辑者,今惟此本行世而已。”^②宋元唯杨齐贤集注、萧士赞删补本通行于世,明清注本仅朱谏、胡震亨、林兆珂、王琦等诸家,亦屈指可数。加之永嘉地处偏远,谢灵运题诗不易得见,后世甚至怀疑李白该诗存在手民之误。

《补注》云:

齐贤曰:唐处州缙云县,谢灵运有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,又灵运《游名山志》曰:石门涧六处,石门溯水上,入两山口,两边石壁,右边石岩下临涧水。(杨齐

贤集注,萧士赞删补《李太白集分类补注》卷一六,元刻本,第3b页)

杨氏谓“唐处州缙云县,谢灵运有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”,认为地在缙云县。而明人朱谏《李诗选注》卷一〇在该诗下注云:

陆路岭行,亦计一百余里,相传李邕为括州刺史时所开,今名冯公岭。南趾即恶溪,合流大溪至石门下,青田入永嘉江处也,谢康乐有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,今以地里考其上下,白亦但言大概耳,不能一一尽同也。……滩上岭路,创自北海,石门洞天,开自康乐,至今松风与猿声相连于洞壑者,何凄凉也。(朱谏《李诗选注》卷一〇,明隆庆刻本,第5a页)

朱谏谓“青田入永嘉江处也,谢康乐有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”,认为地在青田县。检讨二说,其实皆属穿凿。之所以如此,除“石门”之名各地习见外,尚与古今注家对诗中地理关系的误解有关。

魏万来游在天宝年间,缙云县与青田县时皆属缙云郡^③。验以地图,魏万永嘉之行,从海上到内陆,必先达永嘉,后经青田县石门,沿溪上溯缙云县。“缙云川谷难,石门最可观”,显然只能理解为“缙云郡的川谷非常艰险,而郡中的青田县石门最为壮观”,如此方不致前后齟齬,浙南行程亦可怡然理顺。杨齐贤、朱谏等于李白自注不置一词,皆因未明诗旨。

杨齐贤据“缙云川谷难,石门最可观”,以为石门在缙云县,所以造成对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《游名山志》等诗文的误解。而明樊献科《仙都东游记》亦有相同附会,云:“已乃由乌岩、小东山,观铁壁崖,遂憩青云洞,谒谢公祠,家君因谈康乐故事。二叟复引至琅玕洞,取竹为拄杖,乃历甘泉、含晖二洞。下入岩门,即古名石门。唐李白诗曰‘缙云山水难,石门最可观’是也。门左为璇波洞,洞前涧水萦回,仰视岩间,奇石干霄。家君因问康乐《登石门最高顶》诗,献科不能记。”(《缙云文征》卷一四,第6b页)缙云县确有石

门，《(乾隆)缙云县志》谓：“岩门，距妙庭观东六里，两山合抱，中断为门，又名石门。路通马鞍岭，中名小桃源，有琅玕洞、甘泉洞、含晖洞、铁壁岩、璇玑洞、觅仙梯诸胜。”^⑧李白“石门最可观”，指瀑布而言，缙云县石门无此景观，显然非一。又谢灵运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》《石门岩上宿》所言皆是构葺屋舍，长期居住，而《归途赋》谓：“停余舟而淹留，搜缙云之遗迹。”谢灵运取道缙云，只作短暂停留，亦不相合。

朱谏将“岩开谢康乐”理解为“石门洞天，开自康乐”，认为系谢灵运蜡屐以游青田县石门，其实也是望文生义。李白自注“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”，明言题诗在恶溪。恶溪经丽水入大溪，大溪与小溪经青田汇为瓯江，而石门临大溪，恶溪与石门非一地明矣，故朱谏所谓“白亦但言大概耳，不能一一尽同”止当调停之论，难以服人。

正因为前贤注解未确，后世难知其详，故横生枝节，颇多舛误。王琦集注云：“杨升庵引此诗作：远寻恶溪去，不惮恶溪恶。途传李北海，滩闻谢康乐。以‘岩’字为误。”^⑨升庵，即明代学者杨慎，杨氏言“岩”为“滩”之误，认为题壁之事子虚乌有，显然是昧于诗意。与杨慎相比，王琦则较为谨慎，云：

太白自注：恶溪有谢灵运题诗处。《方輿胜览》：谢公岩在好溪上，亦名康乐岩。《一统志》：谢公岩在缙云县南十里，一名康乐岩，谢灵运游宴之地。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一六，第294页)

王琦依据《方輿胜览》《明一统志》等地志材料，认为地在康乐岩。此说新颖，今之学者亦多承之，如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^⑩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^⑪等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前代文献未见谢灵运题诗谢公岩的任何记载，谢公岩亦未见谢诗题刻的任何遗存，因此只能备为一说。

究竟谢灵运题诗如何，我们不妨先从李诗异

文进行考察。前引李白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诗“路创李北海，岩开谢康乐”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刻本下有夹注云：“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。一作：岭路始北海，岩诗题康乐。”二者面貌存在较大差异。

一般来说，异文的产生，就创作者而言更多为有意识的修改，就传抄者而言更多为无意识的窜夺。二者文本差异明显，意味着它们依据的是不同样态的版本。而宋刻去唐未远，因此异文不太可能源于长期的历史堆积，而极有可能来自作者自己的修改。

据目前可考的情况来看，李白诗集的流传相对有绪。溯其本源，主要有两个系统：一是来自好友魏万，据魏万《李翰林集序》：“(白)尽出其文，命题为集。……经乱离，白章句荡尽。上元末，颢于绛偶然得之。沉吟累年，一字不下。今日怀旧，援笔成序，首以赠颢作、颢酬白诗，不忘故人也。”(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一，第3b页)魏万整理李白诗集，始有散佚，后加搜集，又将二人酬赠之作置于卷首，以示拳拳之意。二是来自族叔李阳冰，李白夜郎赦还以后，流落江南，后卒于当涂县令族叔李阳冰家，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云：“阳冰试弦歌于当涂，心非所好，公遐不弃我，扁舟而相欢。临当挂冠，公又疾殒。草稿万卷，手集未修。枕上授简，俾余为序。”(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一，第2a页)另外，乾元二年(759)李白曾请随州僧贞倩編集，李白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》云：“仆平生述作，罄其草而授之。”(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一六，第2a页)但最终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李白诗文集经后世递相整理，北宋乐史收李阳冰所编《草堂集》十卷和别收歌诗十卷，而成《李翰林集》二十卷。宋敏求在乐史基础上，又获魏万所纂李白诗集二卷，复将诗文汇为一帙，收集诗文千篇以上，而成《李太白文集》三十卷。此本于北宋元丰三

年(1080)在苏州由毛渐刊行,今日本静嘉堂文库本即据此本翻刻^⑤。

由此可以说静嘉堂文库本先后吸收了李阳冰、魏万等编纂的不同文献。两种版本,不论是“路创李北海,岩开谢康乐”下加自注“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”,还是径作“岭路始北海,岩诗题康乐”,意思并无二致,即恶溪壁上留存有谢灵运诗刻。

结合相关诗文,我们认为“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”确有其事,而且地在缙云县,理由有以下几点:

第一,从地理上考察,恶溪今称好溪,为唐处州刺史段成式治理后所改。而好溪经丽水入大溪,大溪与小溪经青田汇为瓯江,换言之“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”,显然不能代称“石门最可观”的青田一带,恶溪与石门分属两地,可以明确。

第二,景平元年(423)秋,谢灵运称病去职,离开永嘉任所,经青田溯流而上,过缙云山,北归会稽,所作《游名山记》《归途赋》《山居赋》等均涉及缙云仙都之行。谢灵运《与弟书》亦言:“王右军游恶道,叹其奇绝,遂书‘突星濑’于石。”^⑥右军即王羲之,王羲之与谢灵运先后题壁恶溪,允为一时风气。

第三,李白该诗两种版本,均毫无争议地指向题壁的存在。巧合的是,这两种独立版本系统的祖本的整理者魏万和李阳冰,都雅好石刻,又都有着居游缙云县的经历。李阳冰曾任缙云县令,李白《当涂李宰君画赞》“缙云飞声,当涂政成”(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二八,第1b页),即谓此。《括苍金石志》云:“李阳冰宰缙云时有石刻,见于宋人记载者,如《孔子庙碑》《注隍庙碑》《注尊铭》《忘归台铭》《黄帝祠宇》,又有吏隐山、阮客洞、倪翁洞等篆勒之于石。”^⑦李阳冰宰政一方,缙云县仙都、青田县石门都在李氏题壁之列,游踪所至,皆成胜迹。魏万既是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的写赠对象,又是李白诗集的整理者,“笑读曹娥碑,沉吟黄绢语”,沿途搜访蔡邕、谢灵运等石刻,真

实性也自不待言。概言之,虽然两种独立版本系统存在明显的异文,但主要编纂者对诗刻的记载均无异辞,且异文之间能够形成坚实可靠的互证关系,证明恶溪题刻的存在。

以上考证,为“谢康乐题诗处”划定了大致的地理位置,即缙云县恶溪。而进一步扩大文献查考范围,清理与缙云相关的历代诗文,寻找谢诗题刻的蛛丝马迹,则有可能为题刻具体位置的确定带来突破。在资料查考的过程中,我们注意到明人王思任游记一种,其《游唤·仙都》云:

从括苍至缙云,恶溪复领,吾骨已飢尽。决意奉教仙都,另卜其吉矣。……又五里许,至虎迹岩,仿佛看巨人迹,有三四步,俱丈余大脚掌,洼隆横竖都辨。从一石径束身折转,以膝攀上数十级,回视石之门,似经虎腹中跳出者。侧行至仙榜岩,岩远视则曳长白似榜,而近视俱洞圉列缺。下为陡壑,缘壁那步,访丹室、发摩岩,而足行石硖上,垂二分在外。睿孺辄惶,据以尻代踵,益笑吓之。至丹室,回首反忤然栗恂,不敢迂钮生也。丹室,所谓悬崖置屋者。郑中丞于此奉老子,饮食不捷得,则辗转而卹上之。曠之谓天下奇事必从险中来,良是矣。于是相戒逡巡,下看小赤壁,乃三十丈削就于阊玉。壁下潭方广深



[图2] 小赤壁谢灵运诗刻残迹

蓄怯人,谢康乐、王龟令诸刻剥落不可读。逾数十武,看一岩,上俱碎石短墙,上下俱绝,不知何人所营,谓是飞仙游戏耳。岩前多妙石,巉嵬堆插,绝似《瘞鹤铭》。下又数十武,一石斜倚山扼路,榜曰“云关”,人如鸟过,鲜风透出古荫,毛孔爽英。过此为赵侯船,汉乌伤令赵炳仙解时,乘船至此,覆为石。(《王思任散文注评》,第122页)

按,小赤壁在今缙云仙都境内,临于恶溪(即今好溪),其壁赤色,故名。文中虎迹岩、丹室、云关等皆可与今天的地理位置一一对应。而进一步追溯,为时更早的明王士性《五岳游草》记载:“再历步仙桥,悬崖千仞,色白如抹,名仙人榜,上有谢康乐、王龟龄、朱晦翁诸刻。览毕,下舟,从小蓬莱穿合掌洞至龙舌洲。”^⑧这说明当时尚能辨识。笔者一行数人,根据王士性、王思任所记路径,沿途踏访,寻找相应的地理坐标,最终确认题刻位于小赤壁上,右边为虎迹岩,左边为云关,上方即仙人榜,下方即好溪。笔者一行所见,除较为晚近、刊凿较深的明清题刻外,崖壁间尚留存文字斑驳而时代不明的数段题刻,由于崖壁石质脆弱,风雨剥蚀,加之人为破坏,文字剥蚀日甚,近乎磨灭(参见[图2])。自王士性、王思任而今,星霜屡换,又几近五百年矣,结合文献记载和对历史遗存的实地寻访来看,其为谢灵运等题刻处,当无太大的疑问。

小赤壁谢灵运诗刻在历史上若隐若现,根据我们已有的考证,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:一是原刻的产生,谢灵运任永嘉太守,取道缙云,题壁恶溪;二是题刻的记载,源于魏万来游,而李白述其经历,两人皆追慕谢灵运,故将谢诗题壁记录在案;三是题刻的再度发现,即明人王士性《五岳游草》、王思任《游唤》等文献的记载。饶有趣味的是,谢诗题刻的隐现与山水文学的消长密切相关,谢灵运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与山水诗派的开创,李白时代盛行的山水

游历之风与田园山水诗派的发展,王思任所处时代的地理探索与山水游记的勃兴,山水文学代有消长,谢诗题刻时有隐现,是必然还是偶然?此间境况,耐人寻味。

经过上述考证,可知恶溪谢诗题刻之事确凿无疑,其地不在青田县,而在缙云县。谢诗并非刻于缙云城南十里的谢公岩,而是位于缙云城东十余里处的小赤壁,这一位置的确定解决了李白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一诗注释长期存在的问题,杨齐贤、朱谏、王琦注诗,杨慎改诗,皆未得其实,均可据以正之。

(附记:本文系受浙江缙云博物馆馆长马丁云先生邀请合作调查的成果,在考察研究过程中,肖弘哲先生于本文贡献尤多,向云发先生一同参与,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,并致谢忱!)

注释:

- ①沈约《宋书》卷六七《谢灵运传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6册,第1772页。
- ②《栝苍金石志》卷一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,第1辑第15册,第11292页。
- ③《栝苍金石志》卷一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,第1辑第15册,第11293页。
- ④徐文平《处州摩崖石刻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12页。
- ⑤徐文平《浙南摩崖石刻研究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,第71页。
- ⑥谢灵运著,顾绍柏校注《谢灵运集校注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175页。
- ⑦郑嘉励《石门洞的“谢灵运诗刻”》,“郑嘉励”微信公众号,2020年3月30日。
- ⑧郑嘉励《从青田石门洞“谢灵运诗刻”说起》,“郑嘉励”微信公众号,2020年11月30日。

⑨《宋书》卷六七《谢灵运传》，第6册，第1754页。

⑩从顾先生的注释情况来看，《石门新营》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《石门岩上宿》皆作于谢灵运归隐家乡始宁期间，而《游名山记》下收有“石门山”条，顾先生将其归入“会稽郡”，时始宁属会稽，显然认为诗文“石门”所指为一地。另两种注本，情况相类，参见李运富编注《谢灵运集》，岳麓书社1999年版，第404页；张兆勇《谢灵运集笺释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172页。

⑪鍾嵘著，周振甫译注《诗品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49页。

⑫白居易著，顾学颉校点《白居易集》卷七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册，第131页。

⑬王思任著，孙虹、谭学纯注评《王思任散文注评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115页。

⑭徐世昌编，闻石点校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四七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7册，第6407页。

⑮《栝苍金石志》卷一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，第1辑第15册，第11293页。

⑯参见王士禛《渔洋诗话》卷上，袁世硕主编《王士禛全集》，齐鲁书社2007年版，第6册，第4773页。

⑰参见樊献科《仙都东游记》，汤成烈编《缙云文征》卷一四，清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刻本，第6b页。详见下文讨论。

⑱萧统编，李善注《文选》卷二二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315页。

⑲佚名编选《唐钞文选集注汇存》卷五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册，第513页。

⑳凌迪知编《古今万姓统谱》卷一二五，明汲古阁刻本，第13a页。

㉑《处州摩崖石刻》，第18-24页；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《栝苍石语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81-284页。

㉒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卷二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，第1辑第14

册，第10218页。

㉓赵振华《唐徐峤墓志与徐峤妻王琳墓志初探》，《唐史论丛》第9辑，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㉔刘昫等《旧唐书》卷五〇《刑法志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6册，第2150页。

㉕赵文成、赵君平编选《新出唐墓志百种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64页。

㉖梁克家《三山志》卷二一《秩官类二·郡守》，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44页。

㉗郁贤皓《唐刺史考全编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册，第2144页。

㉘魏万《金陵酬翰林谪仙子》，李白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一四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刻本，第3a页。

㉙永瑤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九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下册，第1280页。

㉚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，第5册，第1596页。

㉛令狐亦岱修，沈鹿鸣等纂《(乾隆)缙云县志》卷一，清乾隆三十二年(1767)刻本，第5b页。

㉜李白撰，王琦注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一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293页。

㉝李白撰，安旗等笺注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卷一一，中华书局2015年版，第3册，第1095页。

㉞郁贤皓校注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卷一三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册，第1919页。

㉟参见郁贤皓《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卷，第336页。

㊱郑缉之撰，孙诒让校集《永嘉郡记》卷一，民国元年(1912)瑞安孙氏玉海楼石印本，第5a页。

㊲《栝苍金石志》卷二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，第1辑第15册，第11309页。

㊳王士性著，周振鹤编校《王士性地理书三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89页。